

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对话

——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学术综述

◎夏光武 黄和璐

2011年10月29至30日,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中文系主办,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协办。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淡江大学副校长高柏园教授、山东大学前校长曾繁仁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前校长傅修延教授等六十余位两岸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还邀请了若干名生态文学作家与会,并在咖啡厅举办了生态诗歌朗诵品评会,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四位诗人——阿红、红豆、姜长荣和忆冷在钢琴的伴奏下,朗诵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生态诗作,四位台湾著名学者分别给予品评。会后,两岸学者还前往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进行了生态考察。近十家媒体采访报道了这次盛会。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四十多位两岸学者在会上发言,这些发言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不少发言涉及国际前沿课题,反映了两岸生态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发展。

一、探讨生态文学理论

在生态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有两个十分重要又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第一是有关生态美学的探讨,第二是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定

义问题。

生态美学因其迥异于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一直是生态文学理论建构较为薄弱的环节,目前在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次会议就生态美学所展开的深入研讨,对于完善生态美学理论建构意义深远。山东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顾问曾繁仁指出,在生态存在论基础上建立的生态美学不同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也就是说,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美学的关系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生态美学具有时间上的现世性、空间上的栖居性与生命美学的特征。面对众学者提出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否会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疑虑,曾繁仁认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将其彻底抛弃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我们一方面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保留其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也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又保留其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由此,延伸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其中包含生态整体主义的重要内涵)”。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的新的时代精神,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发展与环保的双赢。这种新的生态人文主义才是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而这一哲学根基的确立,意味着对以人类中心主义

为根基、以“自然的人化”为核心原则的实践美学的突破,意义深远。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肯定了曾繁仁教授提出“生态存在论”在打开生态美学新思路方面的极大贡献。他强调审美是对生态理想的肯定,生态美学是对生态的维护和对主体性偏颇的克服,“生态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学科,通过生态审美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既包括对自然美的欣赏,也包括对生态灾难的审美批判;它不仅倡导环保主义,更旨在净化人的心灵”。值得一提的是,杨春时对生态美学的应用领域和学科规定性作了严谨的界定。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之外的领域不属于生态美学,一些看似反生态的审美,实际上属于另外的领域,具有其他的审美意义。这就是说,生态美学不能包打天下,它的学科规定性在于关注生态问题,并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山东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程相占则试图通过挖掘环境美学与分析美学的深层关系,以此揭示环境美学的理论背景,并在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凸显环境美学的理论思路和问题意识。他质疑了国内学界对环境美学之反分析美学特征的认定,认为环境美学的一个立场是对分析美学的承续而拓展,因而简单地否定分析美学其实掩盖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基本思路。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胡志红探讨了生态批评的转向,他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学派的创立及其理论建构时期,第二阶段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山东大学学者吴承笃从老子的哲学观入手,强调“老子的哲学源起于观‘变’而思‘常’,其生成论的思想也肇始于‘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在这种不断持续的辩证关系中,老子的生成论“具有非常明显的生态学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他认为老子生成论生态思想有三个重要方面:通过“道生万物”的观点突显出“生”的本源性意义;明

确了生态共生的理论依据;蕴涵人的生态价值观。重庆师范大学学者方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检视英国文学作品,认为英国生态批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二是田园文学的重新思考,亦即以生态责任为内涵的“后田园”观。山东大学赵奎英教授对英国语言学家关于名词化所具有的生态或非生态价值的论争加以再考察,认为名词化本身的复杂性与人们观照视角的不同,形成名词化在绿色语法和世界观建构方面的不同价值。

二、评估两岸生态文学的成就

在两岸生态文学研究方面,许多发言学者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中提取重要的生态智慧。淡江大学教授高柏园认为,中国传统环境思想虽多有高论,但是大多由圣人境界加以展示,较缺乏对客观结构之分解与掌握,而荀子的思想则深入客观结构。他深入论述了荀子的“性伪之分”、“化性起伪”、“天生人成”等环境思想,指出荀子的环境思想由“天人之分”开始,说明人与天、人与自然之关系与区别;再以“天生人成”为实践方向,说明天只负责万物之存在,而人却必须负责万物之价值与意义的完成;而“天生人成”的具体做法便是“化性起伪”,人只能有限度地、在人之分际之内“化性起伪”,建立文明,他并不隐含对人的独大与寡占之肯定。荀子环境思想主张以整体主义的态度去建立文明,文明不但不应该是自然的破坏者,反而是自然的安顿者与发现者。如果善解荀子学,并能善继荀子学,则可望为中国环境思想再添新思路,即在中国古代环境伦理学原有之趋势外,大量吸收客观知识和理性精神,以建立主客饱满的中国环境伦理学。苏州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顾问鲁枢元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入手,展现陶渊明对道家哲学的最高模则“知白守黑”的实践,指出陶渊明是恪守并实践“知白守黑”的完美典范,剖析“知白守

黑”思想对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之生态批评转向的积极影响,并提出回归中华民族传统生存大智慧的倡导:“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及全球性生态运动,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有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傅修延从《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入手,在反复细读之基础上,指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展现了华夏先民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开阔的生态心胸,他们把山川大地看成资源的载体,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和众生各有其形,并且萌发了资源有限的宝贵思想。他高度称赞《山海经》为现代生态叙事的滥觞,认为:“在生态文明时代来临之际重温‘原生态叙事’,有助于我们钩沉业已失落的生态记忆。”

一些学者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探讨在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方面也显得别具一格。中兴大学阮秀莉教授从自然和文化的连续性/连续体出发,以重探“万物有灵论”为焦点,分析原住民自然与文化的连续。她援引两部原住民作品,结合原住民文学与生态思潮,阐明“原住”的生态意义,以及“原住化”世界的美感与伦理。淡江大学学者陈吉斯探讨了台湾新生代原住民文学中的生态管理想象,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台湾新生代原住民是在经营土地而不是空间,土地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分别以亚荣隆·撒可努的影视作品、也寇·索克鲁曼的小说、拉互依·倚芥纪实作品为例,思考了土地伦理问题、传统生态知识问题、景观的力量问题,以及“想象”这个重要的文学因素之于这些问题的意义。台湾中山大学学者周序桦论述了台湾著名自然书作家吴益明的创作,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台湾的自然书写的思考,提出有关自然书写的几个重要问题。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者芮欣以今年9月30日刚刚上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作为引言,分析了台湾原住民对于“山”的纯洁感情与复杂性。她跳脱现有批评的民族主义抗争之视域,分析原住民“生活出来的”自然智慧,指出原住民与

山林的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生态与文化在原住民身上似乎成了充满矛盾而无法被并置的两个词语”。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红讨论了陈应松小说中人与动物的生存困境,从其“神农架小说对于后人性主义现象的刻画与剖析,看作品中的人物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所遭受到的去人性化的命运”。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胡旭则探索顾城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认为顾城“过分在意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恶化程度,却缺乏足够的‘免疫’能力,在精神支柱垮塌之时,不免走向自我毁灭”。哈尔滨师范大学学者汪树东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生态写作曾无处不在”,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精神受到损害。因而,梳理与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能够从反面警醒世人,促使作家超越反生态写作,承担生态启蒙之使命。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学者王悦指出,中国新时期科幻文学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批判“对科学过度崇拜带来的一连串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借用“自身体裁对于时空的穿越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来自江苏高邮的生态诗人姜长荣对中国生态诗歌创作的现状与前景作了一番剖析,将大陆生态诗歌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细数当中的变化与特色。

三、揭示外国生态文学的借鉴价值

探讨外国生态文学的报告数量最多,专家们通过解读外国生态文学作品,为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寻求文本案例,或是论述其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借鉴价值。台湾大学荣誉教授、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林耀福从爱默生诗作《紫杜鹃》的几个版本的译诗出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干预、改变自然以创造文明与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去拿捏干预的尺度,以建构最令‘人’满意的

文明,既能尊重原文(自然),又能达成较高的文学与翻译质度?”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期盼我们能如“《给海伦》里的爱伦坡一样,返抵家园”。他特别指出,生态阅读是重视文本相互关联、碰撞、融合,并将视阈延展到整个生态系而进行的阅读。生态批评既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观点和一种批判模式。生态批评必须照顾到个体与群体: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生态系,而它与其他文本关联,又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黄心雅引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种社群网络的概念,从现代性断裂等问题切入,讨论了当代跨太平洋土著社区及其文学中的海洋动物表现,提出跨海洋想象、人与非人的连接等观点,展现并分析了美国西北海岸、新西兰、夏威夷等地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优美且蕴涵深刻的海洋想象,论述了全球化对地方/土著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入侵。她生动的演讲配上优美的音乐和视频画面,令与会者陶醉,又唤起学者们的深思。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梁一萍探讨麦尔维尔与海洋生态文学,指出对美国而言,麦尔维尔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太平洋海域经验,因为,太平洋是美国的最后一个边疆,最后一个荒野,最后一个在西部之后的“新西部”。她因此将麦尔维尔称为“海洋人”,分析了其作品“如海洋般流动、巨大、无法测量”的充满生态审美的诗性色彩。淡江大学外籍学者包德乐(Dean Brink)从地方(place)生态研究的角度分析约翰·阿士贝里后期诗歌,认为那些作品呈现出位置感的复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夏光武分析了美国作家艾莉丝·沃克诗歌创作的生态转向,尤其赞赏了她最近出版的诗集《艰难时世需要狂野的舞蹈》里呈现的生态体悟。他认为,“从着眼于个人的蓝色躯体走向手牵手的集体狂野舞蹈,恰可说明沃克之所以对‘地球/人/爱’这个生态思维的执着,因为她发现了捐弃前嫌的好方法并推荐给了我们”。他还指出,沃克提出的“祖母精神”概

念与“地球/人/爱”的思维,为人类持续生存于这个世界提供了精神指引。

南昌航空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江山报告了德国女作家鲍瑟王对青少年及儿童生态启蒙教育的贡献,论述了曾在南美教书多年的鲍瑟王的作品之三大主题,即“美南第三世界贫困化、和平反战和自然保护”。大叶大学学者李晶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透视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讨论其中文化对应自然、城市对应乡村的典型二分化,认为作品人物的典型形象经常是为文化/城市而操作的结果。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李美华从19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诗歌研究其生态整体观——“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中的一切,包括人类,都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与会者还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外国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傅俊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洪疫之年》中的宗教隐喻进行了分析,认为《洪疫之年》的情节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而《洪疫之年》原先的标题“上帝的园丁”恰恰是深入理解该书的重要切入点。南京师范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袁霞深入分析了阿特伍德的诗歌《这一刻》,这首诗蕴涵丰富,两性问题、民族意识、自然观都包括在内,而诗歌最后以对大自然的反思结束,突显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性。淡江大学教授蔡振兴则从阿特伍德的生态预警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童年记忆入手,结合福柯理论,从记忆研究、废墟美学的角度解读作品中的“童年记忆所描述的末世景象”,指出“小说成为人文与科学对立的寓言”,而小说所挖掘的童年记忆,正是一种“视觉潜意识”,“以事件的方式来再现过去,让过去的真理浮现出来”。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琳达·霍根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焦点。淡江大学英文系前系主任黄逸民

认为霍根最新作品《靠鲸生活的人》关切的“企业全球化”的议题,因为捕猎鲸鱼本身已经不具传统的神圣意义,而鲸鱼俨然成为象征财富的商品,霍根“纵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亦企图唤起读者思索自然的固有价值及其真实的可能性”。同样来自淡江大学的外籍学者罗艾琳(Iris Ralph)则比较了麦尔维尔的《白鲸》、霍根的《肥胖》、彼得森的《视觉》以及刘克襄、吴晟两位台湾诗人,认为这些作家、诗人及社会运动者的环境叙述可以为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辩护。

爱德华·艾比也是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绕不开的作家。首都经贸大学学者石海毓认为艾比的作品和思想有着明显的后现代建构特性。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征,她分析了艾比作品和思想的创造性,以及他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观,并指出艾比在进行深层的生态思考同时重构了作家的责任。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鄱阳湖学刊》编辑王俊晔指出,对于文明的反思促使艾比成为生态防卫的倡导者,他鼓励热爱荒野的人们起来为荒野而反抗。她反复强调的是,艾比的作品对于个人的生态生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阐明生态文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与会学者紧扣研讨会主题,从生态文化和社会正义等现实问题出发,探讨生态文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韦清琦认为,生态批评应当为21世纪先进的文化作出贡献,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若引进“双性同体”的概念将使其旗帜更为夺目,并可望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新的理据。他强调,女性主义不仅是女人的诉求,而是一种代表了看护、和解、智慧、行善的文化隐喻,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所能够积极追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他热情洋溢地呼吁:“将高

大森冷的城垣抚为平易亲和的‘女墙’吧,这也是人类文明走向和谐社会,地球生态走向复苏的必由之路。”清华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宋丽丽探讨“环境正义生态批评”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密切关系,指出环境正义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把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向种族、阶级问题的延伸,其论述范畴主要包括:环境危机与种族、阶级压迫之间的联系;环境危机与文化权利滥用的联系,尤其是现代中心主义语境下,少数族裔及其文化传统不公正地承担环境危机负担的问题;以及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在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上所能发挥的调适能力。她呼吁改变无节制地物质化自然的现代中心主义的文化模式,“如果保护生态环境仍然在现代中心主义的等级化、物质化的线性文化轨道上进行,那么,环境保护永远跟不上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不能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受害者,不能总是不公正地承担环境恶化的负担,而更应该成为平衡日益极端物质化的现代中心主义文化线性发展模式的希望和力量”。南京大学学者方红认为,美国作家“威廉斯的作品《心灵的慰藉》是后卡森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环境文学之一,体现了美国环境文学的重要特点”。她从物质女权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该书五个核心意象,即“大盐湖、癌症、家人、‘单乳女性’与有翼使神”,说明物质女权主义是反映女性环境体验、强调环境文学政治性的崭新生态批评理论。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学者吴保霖以福克纳小说《去吧,摩西》为例,指出福克纳的怀旧是“对日益消逝的森林与荒野,及其象征的所谓美国‘纯真’价值的失去,感到无法弥补的惆怅”。他还指出,保护纯净荒野的概念其实是二元的解读,在建构荒野概念时单纯地强调回归自然是有疑义的,他主张重新思考自然与荒野的新定义。深圳大学学者江玉琴讨论了族群生态的不平衡问题,她从后殖民生态主义的

视角探讨菲利普·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中文化的失衡与拯救,论述“以自然的净化与人类的自然回归作为对失衡文化生态拯救的途径”。

五、争论重要的学术问题

与会学者不仅深入阐发了他们各自的见解,而且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些学术思想的交锋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

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主张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作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受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生态批评大体上还处于“停留在直接言说世界”的素朴阶段,而无视这种代言是否合法,尚未对自己的言说根据进行系统反思。他认为只有走向“反思性建构”,才有可能克服合法性危机。他指出:“生态批评肩负着关心众生的神圣使命,更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建构。中国生态批评的解构之矛不能仅仅指向外面,更应指向自身的概念、命题、理念、不断地进行自我矫正。”他还对一些批评家以生态的名义无节制地建构宏大叙事,虚构新的二元对立表示强烈反对。鲁枢元等学者认为王晓华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危机估计得过于悲观,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需要注意代言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但也必须认识到,代言自然不是生态批评的全部诉求,甚至不是生态批评的核心诉求,生态批评的主旨是探讨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些探讨寻求这种关系的和谐。的确有一些生态文学家自称自然的代言人,但这种超越人类自我局限为他者考虑、为他者争取权利的善意的、建设性的努力,绝不是有关代言之合法性的理论思辨所能否定的。而且,如果在合法性问题上走向极端,势必连男性为女性争取权利、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的权益代言都要否定了,甚至就连王晓华本人倡导自然主体性以及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鲁枢元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生态批评仍处于弱势、处于边缘的当下,更

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更需要的是大胆的创新。

作为本次会议的“压轴大戏”,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两位教授——团队带头人、厦门大学教授王诺和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团队兼职教授刘蓓——就“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两个术语的解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平等的、激烈的争论,碰撞出闪亮的思想火花,将整个研讨会推向高潮。

刘蓓极力推崇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环境批评的代表学者劳伦斯·布伊尔对“环境批评”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对生态批评的论述。她认为:“主张采用‘环境批评’而非‘生态批评’这个常见术语,恰恰是布伊尔研究的可贵之处。”使用“环境”而非“生态”作为词缀,不仅是为了确定这种研究的学术范畴,或者体现其跨学科性,更是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现实“环境状况”的结果。着眼于“环境批评”,以此来探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环境的关系,并探讨感知这种关系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富有学术建设意义的绿色情怀,不仅没有违背“生态”精神,而且更加符合“生态”精神。

王诺与刘蓓针锋相对,并直接对布伊尔提出质疑,发起挑战。王诺指出,支撑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这两个术语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一个是生态主义,另一个是环境主义。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而深刻的对立,采用两者中的一种,就意味着对一种观念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另一种观念的排斥。而否认这两个术语的差异并混淆它们,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学界公认的词源研究显示,“环境”一词原本就是指人造环境,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人造的环境取代了自然,标志着反自然时代的开始。此外,王诺还就布伊尔对生态批评的非学理性的判断、对其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以及生态批评未来发展之论述的疏漏提出质疑,他甚至认为

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理论整体上看并没有超越19世纪法国批评家泰纳的环境决定论。王诺在阐明他和他所带领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坚持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理由之同时,也肯定了环境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主张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乃至所有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其他批评多元共存。

本次会议上还有一场大会发言别具一格,那就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专家、《人与生物圈》副主编、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陈向军的发言。作为本次会议特邀的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陈向军题为《生态需要生态文学》的图文并茂的发言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他结合中国大陆数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生物圈保护区的案例,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揭示了生态保护实践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以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教授学者参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组织的珠峰生物圈保护区生态和生态文

化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为例,证明生态保护迫切需要生态文化学者和生态文学作家和研究者积极参与。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海峡两岸的两位资深学者——曾繁仁和林耀福教授作了学术总结,他们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质量,热情称赞会上的学术激辩,称其迸发的美丽的学术火花,照亮了两岸生态文学研究的未来。第二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将于2012年10月在台湾中兴大学召开。

【作者简介:夏光武(1962—),男,台湾台北县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黄和璐(1987—),女,福建南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的处所理论和生态作家迪拉德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王俊晔